

幽公盨与益启传说的再认识

李 凯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北京 100875)

The review of Duke Bin xu, a significant bronze vessel made in the mid or late Western Zhou period, gives us great help to make the controvers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Yi and Qi clear. The documents handed down from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long with the the inscription of Duke Bin Xu, indicate that Qi, the son of Yu, killed Yi, the successor of Yu to usurp the throne. The view that Yi aimed the throne of Qi and was murdered by Qi, probably originated from the misapprehension of the idiom "Yi jian yi de" in the mid or late Western Zhou period. The view that Yi and Qi politely declined the throne, was the theory deepened by Mencius on the basis of the ancient "Shan Rang" legends.

Keywords: Duke Bin xu Yi Relation ship between Qi and Yi Western Zhou

内容提要 幽公盨铭文的再读,对弄清迄今争讼不绝的启益关系的悬案的来源有很大帮助。现存的战国以后文献的分析与幽公盨铭文的佐证指向“启于益位”说;“益于启位”说有可能是源于西周中期以后,人们对幽公盨“益奸懿德”一句的误读;“益启揖让”是孟子对上古时代禅让故事的深化。

关键词 幽公盨 益 启益关系 西周

中图分类号 K877.42

文献标识码 A



图一// 幽公盨铭文

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藏幽公盨的披露,使得证明夏代的地下文字资料从春秋时代提前到西周中晚期;但文辞学者多有分歧。铭文中“益奸懿德”一句至关重要,大部分专家认为“益”作增益解,但笔者认为,作增益解则此句非常晦涩。“益”不应是增益之意,是辅佐大禹治水的伯益。我们以此为界将铭文分开:

天令禹敷土,随山浚川。乃拂方执征,降民监德。乃自作配乡民,成父母生,我王乍臣。毕颇唯德,民好明德,夏才天下,用毕邵好。这一部分说大禹治水的功绩:大禹治水,敬德保民,民心好德,夏土大治。

益奸懿德,康亡不懋。孝友^①明,丕齐好祀无凶。心好德闻,构亦唯协。天厘用考,申复用福禄,永御于宁。幽公曰:民唯克用,兹德无悔。后一部分述益佐禹治水:益求懿德,人伦友善,虔诚祭祀,四方和谐,感动神灵,天降福禄(图一)^②。

这样,把“益”理解为伯益,全铭文断为禹、益两段。于是作器者禹益对举,把益当作禹的继承人看待,格式非常整齐。这样,“益奸懿德”的释读,对弄清迄今争讼的启益关系悬案的来源,带来些许帮助。特此为文,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 不应是“益干启位”,而是“启干益位”

益启的瓜葛,记载于下列文献中:

“启代益作后,卒然离孽。何启惟忧,而能拘是达?皆归射鞠,而无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楚辞·天问》)

“益干启位启杀之。”(《古本竹书纪年》)

“古者禹死,将传天下于益,启之人因相与攻益而立启。”(《韩非子·外储说右》)

“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天下之民从之,若尧崩之后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孟子·万章上》)

“禹授益而以启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传之益也。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战国策·燕策》)

“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於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史记·夏本纪》)

“禹荐益,已而以启人为吏。及老,而以启人为不足任乎天下,传之於益。已而启与交党攻益,夺之。天下谓禹名传天下於益,已而实令启自取之。”(《史记·燕世家》)“化(伯)益为天子代禹。”(《汉书·律历志》)

20 世纪 40 年代,顾颉刚、童书业二先生作《复史三论》一文,在《启和五观与三康》中对此矛盾勾画出脉络^[2]。

《天问》说:“启代益作后,卒然离孽。何启惟忧,而能拘是达?皆归射鞠,而无害厥躬?”王逸云:“离,遭也。孽,忧也。”朱子云:“王逸以益失位为离孽,固非文意,补《按指洪兴祖《补注》》以有扈不服为文意粗通,然亦未安。或恐当时传闻别有事实也。《史记》燕人说禹崩益行天子事,而启率其徒攻益夺之;《汲冢书》至云益为启所杀,是则岂不敢谓益既失其位而复有阴谋,为启之孽,启能忧之而遂杀益,为能达其拘乎?”(《楚辞辨证》)案,朱熹说近

表一// 益启关系诸说

| 益启关系 | 出 处 |
|------|------------------------------|
| 益干启位 | 《天问》、《古本竹书纪年》 |
| 启干益位 | 《战国策·燕策》、《韩非子·外储说右》、《史记·燕世家》 |
| 益启揖让 | 《孟子·万章上》、《史记·夏本纪》 |

是!《战国策·燕策》说:“禹授益而以启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传之益也。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韩非子·外储说右》、《史记·燕世家》文略同)《汉书·律历志》载张寿王的话也道:“化益为天子代禹。”道是说益已受禹的天下,而又被启所夺,便是《天问》“启代益作后”一语的注脚。《古本竹书纪年》说:“益干启位启杀之。”(《晋书·束皙传》)道是说启已做了天子,益还想把这个位抢归自己,于是为启所杀,便是《天问》“启……卒然离孽。何启惟忧,而能拘是达”诸语的注脚。王夫之云:“拘,囚禁也;达,逸出兴师也”;刘盼遂先生读“惟”为“罹”,说并近是!

顾老站在非儒家经典的立场上,批评《孟子·万章上》的杜撰:“启是被禹认为不足任天下的...但是禹的这个不肖子到了儒家的学说里却变成了一个克家的令子了”,儒家把益、启都说成了贤人,“启固然是禹的儿子,益也不失其大贤的资格;一场征诛的惨剧变成了揖让,我们真不能不佩服儒家改造古史的聪明的手段!”到汉代,《史记·夏本纪》照抄《孟子》,只有少许不同。于是此说成为正史,干启位、启杀之的言论就自然而然被看作异端邪说(表一)。

顾老的思路,是依靠《天问》,拿《古本竹书纪年》等战国文献来否定晚出的《孟子》与《夏本纪》,脉络清晰。

但是,我们仍有疑问:首先,上述诸多文献年代都比较晚,是战国以后的作品,何以偏偏认定《古本竹书纪年》的“益干启位”为真,而《孟子》的益启揖让为假?第二,上述论证依据就是《天问》的“启代益作后,卒然离孽;何启惟忧,而能拘是达?皆归射鞠,而无害厥躬”,然而其中的“卒然离孽”与“启惟忧”到底指什么,十分含糊,洪兴祖的《补注》甚至还附会于《甘誓》的启伐有扈一事^[3],可谓是扑朔迷离,所以,《天问》所指代的事件,还有以后待考的余地。

我们不能确定“卒然离孽”与“启惟忧”指什么,但云“卒然离孽”与“启惟忧”指“益干启位,启杀之”一事,怕是和上下文不吻合;按《天问》上下

文的格式,应该是两句陈述、两句发问相交错;所以顾老引的《天问》,应该再加上后面两句“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为宜:“启代益作后,卒然离孽。何启惟忧,而能拘是达?皆归射鞠,而无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

顾老所引“皆归射鞠,而无害厥躬”句是在承接前四句说启化险为夷;但加上“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的话,意义变化为:“皆归射鞠,而无害厥躬”是说禹、益的同样经历非武力的禅让,没有伤害自身;但伯益遭遇兵戈,而禹却能建立治水之功,两者命运不同。

我认为,其中的“皆”很关键,就是着重强调这句话是说下面的益和禹,他们都是“归射鞠”的,而不是说上面的启。“鞠”本作“鞠”,注云“鞠,穷也”,本义为审问罪人;“归射鞠”这里就是指放弃武力采用禅让的方式^[4]。既然益、禹都放弃武力“归射鞠”,则言“卒然离孽”与“启惟忧”指“益干启位,启杀之”一事,就明显说不通了。郭沫若先生未采用顾说,将这八句译作:“夏启代替伯益做了国王,而终于杀死了伯益,从失意的情况中,启又为什么能转入得意?未行征诛,同受禅让,为何伯益失败,夏禹繁昌?”^[5]基于此,袁珂先生认为,益之被杀,不是因为“益干启位”,而是“启干益位”^[6],与《战国策·燕策》、《韩非子·外储说右》以及《史记·燕世家》的记载相合。所以,笔者认为《天问》所持的态度恰恰应是“启干益位”说。

近年《上博简》佚书《容成氏》的公布,佐证了“启干益位”说,简33、简34云:

禹有子五人,不以其子为后,见皋陶之贤也,而欲以为后。皋陶乃五让以天下之贤者,遂称疾不出而死。禹于是乎让益,启于是乎攻益自取。

大禹在让位伯益之前,曾要让位给皋陶,可是皋陶“乃五让以天下之贤者,遂称疾不出而死”。皋陶这种表现耐人寻味:是他真的有隐居山林的许由之志?还是他已经预料到即使即位,也将面临和启之间的最高权力之争^[7]?我认为,后者的可能性很大。皋陶回避,是因为他看到世袭代替禅让是场不可避免的血光之灾,这个悲剧留给了伯益。可见,伯益的命运悲剧是必然的;其责任不是伯益“干启位”咎由自取,而是启的野心膨胀与“家天下”时代的来临,这和启在文献中的贬词相合。

益的大贤形象,与幽公盥铭文相通:

益奸懿德,康亡不懋。孝友_益明,圣齐好祀无凶。心好德闻,构亦唯协。天厘用考,申复

用福祿,永御于宁。幽公曰:民唯克用,兹德无悔。

倘真有“益干启位”一事,严明君臣之分的周代人还将一个乱臣贼子作为圣贤称颂,似不合情理。传世典籍还可清晰地看到益对历史发展的功绩,《孟子·滕文公上》:“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史记·夏本纪》:“(禹)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淮南子·本经训》云:“伯益作井而龙登玄云,神栖昆仑。”《帝王世纪·五帝》:“益为朕虞,庶物繁植。”甚至《吴越春秋》、《论衡》把《山海经》也归功于伯益。《伪古文尚书·大禹谟》记载,三苗不驯,舜令禹讨伐,不克。益建议,“惟德动天,无远弗届。满招损,谦受益,”把以德报怨、感天动地、至孝至仁的舜德为榜样,诚心修德;至诚能感动天地鬼神,何况三苗?于是禹纳益言,向帝舜建议改变策略,不兴兵戈,舞干羽于两阶,七十天后三苗心悦诚服。此记载虽为伪古文,但也有参考作用。益立足于民本,居安思危,敬天保民,与幽公盥铭文中“奸懿德”、“心好德”、“天厘用考,神复用福祿,用御于宁”的赞语是一致的。

在周人中口耳相传的是,益是和禹、皋陶、后稷一样的圣贤,如《墨子·尚贤上》:“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墨子·所染》:“禹染于皋陶、伯益”;《荀子·成相》:“禹傅土,平天下,躬亲为民行劳苦,得益、皋陶、横革,直成为辅”等等。《史记·秦本纪》祖述伯益较详:“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已成,帝锡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帝舜曰:‘咨尔费,赞禹功,其赐尔皂游。尔后嗣将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伯益佐禹治水有功,被赐姓嬴氏;他作为虞官格外称职,“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人们还歌颂伯益掌火、作井、种稻,并且以各种方式纪念他,《吕氏春秋·慎行论·求人》:“得陶、化(伯)益、真窥、横革、之交五人佐禹,故功绩铭乎金石,著于盘盂,”说正是因为伯益等五人的辅佐,才使功绩被后代记录在铭文上。幽公盥禹、益并举,俨然益作为禹的继承人出现,与文献是吻合的。

综上,从战国文献与幽公盥中可以看出,益启关系以“启干益位”说为妥。

二 “益奸懿德”与“益干启位”

《古本竹书纪年》的“益干启位,启杀之”与其他文献的反差是怎么产生的呢?我认为,这正好与

幽公盥的“益𡗗懿德”的理解相关。

“益𡗗懿德”中“𡗗”，是困扰人们的疑难字，该字位于第五行最后，因铸范破坏释读难度大。按笔路，似为“𡗗”。或释为“求”^[8]，或释为“美”^[9]；仔细观察此字，应是上下两部分，与“求”的甲骨文“𡗗”有差别；与从羊从大的“美”亦不同。审视该字下部分“𡗗”，虽有损毁，但可清晰看到竖笔上下出头，横笔有翘动。李学勤先生将之隶定为“𡗗”^[10]，则符合原来字型。

我认为释读为“奸”，“𡗗”是“奸”的上下结构。声旁“干”对意义起到支配作用，“奸”因而具备两个意思：（一）中性角度而言，“奸”因“干”可训为“求”，诸学者将“𡗗”从上下文推测该字意义应是求。其实“奸”解释为“干”文献有例，《庄子·天运》：“以奸者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史记·穰侯列传》：“以此时奸说秦昭王”，《齐世家》：“以渔钓奸周西伯”，《正义》：“奸音干。”（二）贬义角度而言，“奸”可训为犯。往往汉字中从“女”的都有贬义，它们从中性词孳乳而来，“奸”亦然。《说文》：“奸，犯淫也”，就是男女私通，后与“姦”之“姦”音同混淆。“奸”训“犯”是古书的常见义，如《左传·僖公七年》：“违此二者，奸莫大焉”；《成公二年》：“巩伯实来，未有职司于王室，又奸先王之礼”；《昭公元年》：“国之大节有五，女皆奸之”等等。由“干”孳乳的“奸”因为音同所以相通，“干”于是后来不仅有“求”义，亦有“犯”义；同样“奸”不仅有“犯”义，亦有“求”义。

“懿德”金文恒见，意谓好德行，系金文的恒语。“益奸懿德”便有褒贬两种理解：“奸”训“求”则益追求崇高的德行，训“犯”则益败坏道德。启益关系之分歧，可能是由“奸”不同理解造成的：好事者曲解了幽公盥“益奸懿德”的“求懿德”本义，训“奸”为“犯”，而且杜撰出“益干启位，启杀之”的故事来佐证自己。战国时代喜好搜罗稗官野史的人，把“益干启位，启杀之”同其他带有血腥色彩的野史，放到《古本竹书纪年》中，于是启益间关系开始复杂化。

人们在战国后渐渐遗忘了“益干启位，启杀之”的事件，直到西晋时《竹书纪年》大白天日。之所以这样，原因除了战国时士阶层崛起，禅让之风大盛以及后代鼓吹禅让的儒学被统治者利用外，“益干启位，启杀之”一事自身的脆弱无力同样是被人们遗忘的原因。若“益干启位，启杀之”果有其

事，何以古书中其佐证单薄，而颂益的记载汗牛充栋呢？

李学勤先生指出，为战国现实政治而改造历史是《古本竹书纪年》的一个思想倾向。“益干启位，启杀之”同“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后稷放帝朱于丹水”、“伊尹放大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放大甲七年，大甲潜出自桐，杀伊尹”的故事极其相象，“带有战国时期游说的那种意味”。李先生以伊尹为例：

以伊尹一事而言，殷墟卜辞所见对伊尹的祭祀非常隆重，如果他是曾废太甲自立，后来又太甲诛杀的罪人，怎么能享有那么隆崇的地位呢？^[11]

李先生在这里用卜辞说明伊尹的问题，与我们用幽公盥再认识益同理。在金文中，不乏有名“益”者出现，这说明“益”在那时人的眼中还是很好的字眼：

益公为楚氏和钟。（《集成》，16）

毕鲜作皇组祖益公尊簋。（《集成》，4061）

益公右走马休。（《集成》，10170）

益公内即命于天子。（《集成》，10322）

益作为野心家的说法是很薄弱的。所以清人马骥批评“益干启位，启杀之”一句为“此好事者为之也”是有道理的^[12]。就连依据《竹书纪年》更改《史记》之讹误的钱穆先生，也对“益干启位，启杀之”的说法采取存疑的态度^[13]。

进而我们可以猜测，这件西周中晚期“益奸懿德”，便是分歧产生的转折点；故而启益间关系复杂化的时代，应在西周中晚期以后。

三 “益启揖让”说

春秋以后，随着世卿世禄的打破与士阶层的崛起，禅让从上古时代朦胧的记忆里被抬了出来，“益启揖让”说应运而生。

顾颉刚先生认为，孟子是否定禅让的，原因有三：首先，孟子批评过燕王哙和燕相子之的禅让闹剧：“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有仕於此，而子悦之，不告于王而私与之吾子之禄爵，夫士也，亦无王命而私受之于子，则可乎？”（《孟子·公孙丑下》）孟子言必称尧舜，理应对燕王哙和子之的禅让盛赞，在此却严厉抨击，令人费解。其次，当万章请教他：“尧以天下与舜，有诸？”他斩钉截铁地否定：“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万章问：“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他答：“天与之。”第三，孟子进一步解释，舜曾经荐禹于天，舜崩，禹避于阳城天下之民从之；禹荐益于天，禹崩，益避于箕山

之阴,天下之民不从益而从启。这与《尚书·尧典》尧禅舜、舜禅禹这样直接禅让给继承人的记载不吻合^[1]。

我们认为,孟子诟病于燕王哙和燕相子之,显而易见的原因,不是因为他反对禅让,而是燕王哙和燕相子之“无王命而私受之”,没有请示代表天意的周天子。孟子认为选择君王的是天,这与《尚书·尧典》不矛盾,因为《尚书》禅让恰是基于敬天保民的前提,正是因为舜、禹敬天保民才被选为继承人。这样,与其说孟子否定禅让,毋宁说孟子是对万章“尧以天下与舜”这种片面理解的更正。

孟子的禅让观并不同于当时流俗所理解的禅让,他全力鼓吹民本精神与天命观,以此来作为支持点: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尧,禹之相舜也,历年多,施泽于民久。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益之相禹也,历年少,施泽于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远,其子之贤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万章上)》。

孟子的阐述使禅让观上升到了哲学思辨的深度。禅让必须符合天意(即所谓“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而周天子之意就是天意,所以他责备燕王哙和燕相子之自行禅让而“无王命而私受之”;天意体现于民意,舜、禹施泽于民久则民从之,益未久则去之。这样,使当时被庸俗化的上古时代禅让故事内涵大大深刻了。固然后世统治者标榜儒家的禅让观,君主集权的强大只停留在理论层面,但孟子所揭示的民本精神与天命观的影响是格外大的。

《史记·夏本纪》秉承了孟子的这种说法。《越绝书·吴内传》索性回避了启益间的纠葛,“益与禹臣于舜,舜传之禹,荐益而封之百里。禹崩启立,晓知王事,达于君臣之意,益死之后,启岁善牺牲以祠之。经曰‘夏启善牺于益’,此之谓也。”“达于君臣之意”谓启依然把益当作受禹禅让之君,故此用牺牲行君臣之祠礼。严格的君臣之分蕴涵在其中,这是秦汉以后浓墨重彩渲染的。

综上,孟子基于上古禅让故事把益启关系上升到思辨深度。

我们今天看到的益启关系是非常复杂的,是因为它经历了相当长的发展过程。首先,就现存的战国以后文献的分析来看,绝大部分指向“启干益位”说,这一点在幽公盟铭文中得到了佐证。其次,

“益干启位”说有可能是源于西周中期以后,人们对幽公盟“益奸懿德”一句的误读。再次,“益启揖让”说是孟子对上古时代禅让故事的深化,凸显了民本精神与天命观。幽公盟铭文对我们缕清这一脉络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1]详细考证见李凯、周晓陆:《幽公盟铭文再笺》,《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十二辑,三秦出版社2005年。

[2]吕思勉、童书业编著:《古史辨》第七册中编,上海书店影印本1980年版,第207~210页。

[3]“启代益作后,卒然离孽”句,洪兴祖的《补注》云“言禹以天下禅与益,益避启于箕山之阳。天下皆去益而归启,以为君。益卒不得立,故曰遭忧也。”“何启惟忧,而能拘是达?”句,《补注》云“言天下所以去益就启者,以其能忧思道德,而通其拘隔。拘隔者,谓有扈氏叛启,启率六师以伐之也。”

[4]“笱”意义有二:(一)训为穷,是一种窘迫凶险的生存状态;(二)训为桎,有械系拘禁的意思。见赵平安:《释“”及相关诸字》,《语言(第三卷)》,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在这里郭老使用后一个意思。

[5]郭沫若:《屈原赋今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80页。

[6]袁珂:《中国神话传说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第326页。

[7]陈丽桂:《谈〈容成氏〉的列简错置问题》,《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续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第343页。

[8]朱凤瀚:《益公盟铭文初释》,《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6期,第32页。

[9]李零:《论益公盟发现的意义》,《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6期,第38页。

[10]李学勤:《论益公盟及其重要意义》,《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6期,第6页。

[11]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0~51页。

[12]马骥:《绎史》第1册,齐鲁书社2003年,第143页。

[13]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自序,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23页。

[14]说见其文《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墨子的托古》,《古史辨自序》,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04~105页。我们不妨对比孟子与荀子,《荀子·正论》的“夫曰:尧、舜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不知逆顺之理,小大、至不至之变者也,未可与及天下之大理者也。”相形之下,荀子对禅让明显是抨击的,而孟子仅仅是对万章“尧以天下与舜”片面理解的否定,是对禅让内容的补充。